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

梁启超

刘炎生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
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
合编

岭南文库
知识书系

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



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



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
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 合编

梁启超

刘炎生 著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梁启超/刘炎生著. —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
2004.12

(岭南文化知识书系)

ISBN 7-218-04744-0

I. 梁… II. 刘… III. 梁启超(1873~1929)—生平事迹
IV. B259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02478 号

责任编辑	沈展云 赵殿红
封面设计	邦 邦
责任技编	黎碧霞
出版发行	广东人民出版社
印 刷	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(厂址: 台山市北坑工业开发区)
开 本	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印 张	3.875
插 页	1
字 数	4 万
版 次	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5000 册
书 号	ISBN 7-218-04744-0/B·155
定 价	1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(020) 83794727 83791753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顾问

(按姓氏笔画为序)

叶选平 任仲夷 杨应彬 杨资元
吴南生 张 磊 陈绍基 欧 初
钟阳胜 梁灵光 蔡东士 颜泽贤
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

主 编:

朱小丹 岑 桑 (执行)

副主编:

方健宏 陈俊年 朱仲南 黄尚立

王桂科 陈海烈 (执行)

编 委 (按姓氏笔画为序):

方健宏 王桂科 庄 昭 刘斯翰

吕克坚 朱小丹 朱仲南 辛朝毅

李夏铭 岑 桑 陈泽泓 陈俊年

陈海烈 金炳亮 倪俊明 黄尚立

出版说明

岭南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特色鲜明、灿烂多彩、充满生机活力的地域文化，其开发利用已引起社会的重视。对岭南文化丰富内涵的发掘、整理和研究，虽已有《岭南文库》作为成果的载体，但《岭南文库》定位在学术层面，不负有普及职能，且由于编辑方针和体例所限，不能涵盖一些具体而微的岭南文化现象。要将广东建设成为文化大省，必须首先让广大群众对本土文化的内涵有所认识，因此有必要出版一套普及读物来承担这一任务。出版《岭南文化知识书系》的初衷盖出于此。因此，《岭南文化知识书系》可视作《岭南文库》的补充和延伸。

书系采用通俗读物的形式 选题广泛，覆盖面广，力求文字精炼，图文并茂，寓知识性于可读性之中，使之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丛书。

《岭南文化知识书系》由岭南文库编辑委员会与广东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共同策划、编辑，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工作，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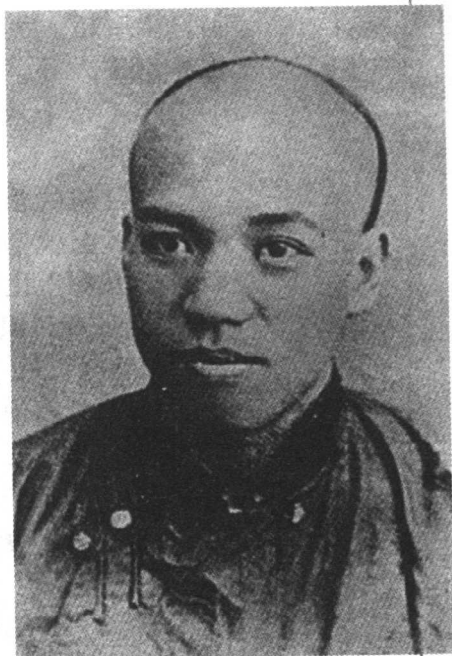
岭南文化知识书系编辑部

2004年8月

目 录

一、科场成名	2
二、在万木草堂	6
三、投身戊戌变法	14
四、闪光的启蒙思想	26
五、宣扬西方思想文化	35
六、倡导文学革命	42
七、致力立宪运动	48
八、维护共和	53
九、五四运动前后	76
十、国学大师	85
十一、宣传新文化	89
十二、真挚的爱	103
十三、伟人陨落	110

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杰出政治活动家、思想家和大学问家。他一直怀着强烈的爱国精神，为拯救祖国的危亡，促使人民的觉醒和发展学术文化，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，奉献了毕生的心血和力量。他的生命像一条滔滔奔流的江河，他的终极成就像一片浩瀚的海洋。他无愧为中华天空中的一颗巨星，堪称中西文化孕育的一代英才。



青年时代的梁启超

一、科场成名

梁启超，字卓如，号任甫，又号任公和饮冰室主人等。1873年2月23日（清同治十二年正月十六日），出生于广东新会熊子乡茶坑村。

梁启超的祖父梁维清是秀才，曾是负责管理一县文教事业的八品官教谕。父亲梁宝瑛也有文化涵养，曾在乡里教授私塾。母亲赵氏知书识礼，教子有方。他们对梁启超充满爱心，精心培育。梁启超二三岁时，母亲就教他认字。四五岁时，父母授四书和《诗经》。六岁至十岁，祖父授《中国略史》和五经。同时，他们也注重对梁启超良好的品德教育。对他的言行举止，要求颇为严格。他六岁时不慎说了一句谎话，其母便要他跪下，伏其膝前，加以鞭打，并说：“汝若再说谎，汝将来便成窃盗，便成乞丐。”“人何故说谎？……天下万恶，皆起于是矣。……将来人人皆指而

目之曰，此好说谎话之人也，则无人信之。”对于母亲的教训，他一直视为“千古名言”，“常记在心”。祖父更是常常对他灌输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意识，经常将李白、杜甫、岳飞等人的有关诗词念给他听，而且颇带感情。以至他六岁时便能背诵岳飞的《满江红》，并一直“喜诵不衰”。祖父还常常带他参观茶坑村的北帝庙和崖门，将那些忠臣名将的爱国事迹和南宋灭亡的悲壮史实讲给他听，使他深受感染。可以说，这些教育为其毕生矢志爱国、救国和报国种下了根苗。

梁启超七八岁时，受教于两位启蒙塾师乙星和周星吾，不仅学习了一些经史知识，而且学会了写长达千言的文言文，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智力。时人称赞他为神童。12岁时，即1884年10月间，梁启超到省城广州参加院试，考取秀才，名列前茅，博得主考叶大焯的赞赏。1885年，梁启超到广州求学。先拜吕拔湖为师，次年就学于陈梅坪。他们都有汉学修养，使梁启超获益匪浅。1887年，梁启超进入学海堂就读。历时四年，一直勤奋异常，并当了菊坡精舍、粤秀书院、粤华书院的院外生。他刻苦好学，天资聪颖，每次考试均取得优异成绩，成为出类拔萃的高才生。



1899年的梁启超

正因为是学海堂学子中的佼佼者，所以梁启超决定参加 1899 年 8 月举行的广东乡试，即考举人。这次考试的主考是李端棻。乡试共设三场，分别于初九日和十五日举行。考场设在广州城东南的贡院。初九那天上午，梁启超按时进入考场。他领到试卷后，认真把要求写一篇八股文和作一首诗的试题看了

一遍，很快写成了学识丰富、文情并茂和文字功底扎实的诗文。其他两场应试，梁启超也考得颇为顺手。

结果，9 月放榜时，梁启超榜上有名，排列第八。这年，他才 17 岁，成为最年轻的举人。他第一次应试便取得成功，真可谓少年得志，一举成功，轰动一时。

梁启超年纪轻轻便显示了出色的学识和才华，因而深为主考李端棻赏识，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他。

二、在万木草堂



康有为为了培养和造就救国人才，于1890年初在广州布政司前惠爱街曾祖父康式鹏（字云衢）的老屋云衢书屋从事讲学活动。3月间，梁启超的学海堂同学陈千秋拜见康有为。言谈间，深感康有为大有卓识才学，便于6月离开学海堂，改为受教于康有为门下。8月间，陈千秋看望梁启超，盛赞康有为颇有新颖思想和渊博学问。梁启超听了后，非常高兴，立即要陈千秋带他去见康有为。结果，康有为那种充满豪

情和惊人见识的谈论，使梁启超极为震惊和佩服。尽管自己是举人，而康有为不是，但梁启超却心悦诚服地拜康为师。这充分表明梁启超是一位不计较身份地位，虚心求教的人。

由于陈千秋、梁启超和徐勤等接连前来拜康有为为师，到年底康有为便招收了 20 位学子。而且前来就学者日益增多，云衢书屋实难以容纳。于是，1891 年春，康有为为应梁启超、陈千秋的请求，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屋（今广州市中山四路长兴里 3 号），正式开设学堂，称作长兴学舍。不久，前来就学的愈来愈多，学堂又容纳不下，只好把学堂迁至卫边街邝氏祠（今广州市吉祥路北段），这时就学者已达 40 人。至 1893 年，前来求学者继续猛增。在梁启超、徐君勉的大力支持下，学堂又迁至广州府学宫的仰高祠（今广州市文明路第一工人文化宫），并改名为万木草堂。这时就学者已达 100 余人。万木草堂周围树木参天，环境幽雅，是讲学读书的理想之处。康有为拟在这里办学十年，培养大批具有维新思想的人才。因而，他特地将题有“万木草堂”四个大字的一方匾额，悬挂在大门上方。这一命名，既含有树木树人之意，也隐寓有欲得明主，维新图强的用心。康有为在万木草堂讲学八

年，培养了近千名学子，其中除陈千秋、曹太早逝外，大都成为他后来倡导维新变法运动时的骨干力量，而梁启超更是成为时代的风云人物，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很有作为和建树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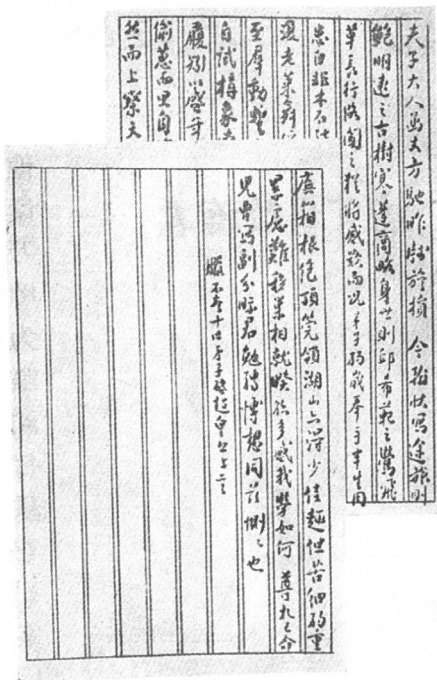
梁启超在万木草堂学习了四个春秋。由于有康有为的辛勤培养和较好的学习条件，加上天资聪颖，刻苦钻研，梁启超学到了很多新进知识，更重要的是思想上有很大的提高，为他的人生走向和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主要收获是——

确立了一心救国的宏大志向。康有为讲学的根本宗旨，在于培养具有爱国思想并有救国才能的人才。他制定了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，对“德”的要求很高很严，强调格物克己，励节慎独，要求力戒“四耻”，即耻无志、耻循俗、耻鄙吝、耻懦弱。梁启超对此有自己的深刻理解，认为其教旨专在“节励气节，发扬精神”，“使人胸怀大志，不图个人荣华富贵，勇于肩负救国救民的重任”。而且康有为在讲学过程中，也经常联系国家衰弱、列强欺凌和民生痛苦的情形，爱憎感情非常强烈，甚至声泪俱下。每当此时此刻，梁启超便格外全神贯注地聆听，心情激动，颇受感染，增强了救国救民的责任感。可见，梁启超这时已确立了

救国之志。而这一志向的树立，对他不久后追随康有为从事变法维新运动乃至终生为救国尽力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。

学习了丰富的中西文化知识。梁启超颇为系统地学习了中国传统文化，如孔学、佛学、先秦诸子学、宋明理学、中国经学史学、中国政治沿革得失、中国词章学等；同时又接触了许多西方文化知识，如泰西哲学、万国史学、万国政治沿革得失、外国语言文字学等。这两方面知识的获得，主要来自听课和自学。康有为讲授这些中西文化知识时，学问渊博，融会贯通，不带讲稿，口若悬河，而

且重视讲源流变化和作中外比较。梁启超说过，“其授业也，循循善诱，至诚恳恳，殆孔子所谓诲人不倦者焉。其讲演也，如大海潮，如狮子吼，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，使之



梁启超致康有为手札

惊然感动，终身不能忘，又常反复说明，使听者涣然冰释，怡然理顺，心悦而诚服”。“余生平于学界稍有所知，皆先生之赐也。”这些话足以说明梁启超的确从康有为授课中学到了丰富的知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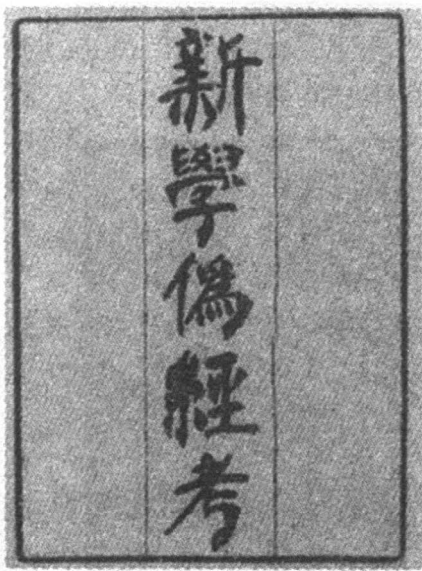
《康有为政论集》

在自学上，康有为也给梁启超指明了门径，使他懂得了应读哪些书，先读什么，后读什么。而且万木草堂设有“书藏”，即图书馆。其中存放着康有为的两万多册图书和家长赠送的不少书籍，供学生阅读。梁启超生性好学，每天手不释卷，阅读了大量的中西文化著作，如《公羊传》、《春秋繁露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宋元学案》、《诸子语类》、《四库提要》、《二十四史》、《文献通考》，以及达尔文、卢梭、孟德斯鸠等西方文

化名人著作的译本。在阅读中，梁启超坚持写读书笔记，以加深理解，形成自己的心得和看法。他曾说，“无笔记则必不经心，不经心则虽读犹不读而已”。此外，他采用精

读和泛读相结合的方法。他认为“学者每日不必专读一本书。康先生之教，特标专精涉猎二条，无专精则不能成，无涉猎则不能通也”。可以认为，正是勤于读书和善于读书，使梁启超获得了大量的中西文化知识，奠定了学问的根基。

提高了研究和著述能力。梁启超是康有为最赏识的门生之一，曾做过万木草堂的学长，不仅学问修养好，而且具有很强的研究和著述能力。之所以能这样，首先在于从康有为的教诲中知道经世致用的重要，“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”。同时，参与了康有为的著述活动，得到了很好的锻炼。康有为编著《新学伪经考》时，梁启超从事“校勘”。而且，不是只作文字和史料上的勘误，而是有独到的见解，“时时病其师之武断”。即是说，他对康有为所论并非“深信不疑”，而是有不同的见解。可见，他这时已



康有为著《新学伪经考》